

1940年代中国画的海外传播

——以徐悲鸿南洋筹赈展览为中心

高可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 在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以中国美术教育家和画家的身份出访南洋，携带大批作品，举办一系列筹赈画展，支援国内抗战事业；他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他的爱国情怀与国际主义精神深受社会各界人士感动。文章从南洋之行入手，结合徐悲鸿艺术活动和展出作品，解析其艺术思想和情怀寄托，此次海外行旅不仅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写下重要的篇章，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页。

关 键 词： 筹赈展览；徐悲鸿；抗日战争

检 索： www.artdesign.org.cn

中图分类号： J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832(2024)05-0114-03

Overseas Spread of Chinese Paintings in the 1940s: Centered on Xu Beihong's Nanyang Relief Exhibition

Gao Ke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Xu Beihong as a Chinese art educator and painter visited the south seas, carrying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organized a series of relief exhibitions, to support the cause of the domestic war; he is committ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to enhanc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His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were deeply touched b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 article from the trip to Nanyang, combined with Xu Beihong art activities and works on display, analysis of his artistic thinking and sentiments, the overseas trip not only in China's modern art history wrote an important chapter, also become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with unique significance of a page.

Keywords : fundraising exhibition; Xu Beihong;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ternet : www.artdesign.org.cn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美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宣传中国美术到宣传抗战，艺术家们的民族意识觉醒，他们开始走向了为抗战而艺术的道路，认识到将艺术作为宣传工具和思想武器，积极开展一系列抗战美术作品的宣传活动，鼓舞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斗志。此时期的艺术家不仅在国内组织开展美术展览活动，中国美术在海外展览传播的次数也日渐增多。徐悲鸿作为爱国主义艺术家，高扬国际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出访东南亚地区，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积极在当地举办一系列筹赈画展，为支援国内抗战事业。通过现有的报刊材料以及新发现的档案史料梳理来看，徐悲鸿筹赈展览目录中的作品《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等大多都是反映战时中国的题材，南洋各国领导人以及平民百姓的社会各界通过了解他的艺术作品、艺术活动，从而加深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同情与支持。本文以徐悲鸿在南洋的筹赈画展为切入点，围绕他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观念在海外的传播状态，试图认识中国美术家的历史性贡献。

一、展览回顾

1938年7月，徐悲鸿携大批作品离开重庆，历经桂林、江门、香港到新加坡。先后在东南亚地区的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国进行了为期三年有余的艺术访问与画展活动。为宣传中国抗战精神，传播中国文化艺术，

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

从表1来看，徐悲鸿在东南亚国家一共举办了六场个人展览，其中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四场展览是以筹赈画展为主，通过艺术作品的多种义卖方式来筹款捐助国内战时救济事业。而印度的两次画展则是以传播中国美术，敦睦中印两民族友谊为主。1939年至1941年的徐悲鸿居住在相对安宁的环境，感受南洋地区的风俗民情，观摩自然风景，此时期也是其创作生涯的鼎盛阶段。

时间	展览名称	地点	作品总数	筹款金额
1939年3月 14日—26日	徐悲鸿教授 作品展览会	新加坡维多利亚 纪念馆，3 月18日移至 新加坡中华总 商会	171幅	15398.95元 叻币
1939年12月 23日	徐悲鸿画展	印度圣蒂尼克 坦国际大学	100余幅	无
1940年2月 中旬	徐悲鸿绘画 展览	印度加尔各答 东方美术学社	206幅	400卢比
1941年2月8 日—15日	徐悲鸿先生 画展助赈	马来西亚吉隆 坡中华大会堂	300余幅	17800元叻币
1941年3月1 日—7日	徐悲鸿先生 画展助赈	马来西亚霹靂 州怡保波士打 律韩江公会	百余幅	10000元叻币
1941年3月 29日—4月4 日	槟城筹赈会 画展	马来西亚檳城 惠安公会	不详	12000元叻币

> 表1 徐悲鸿南洋的个人美术展览简表

徐悲鸿第一次画展于1939年3月14日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展览开幕礼，随后在3月18日移至中华总商会展出，由星华筹赈会主办。展览以中国画和油画为主，题材多以人物居多，共171幅作品。因是筹赈画展，与当时国内一些地区举办的个人画展相比而言，其作品数量还是较多，画展中的作品一些是以描绘国内现实生活为题材，还有表现历史寓言为主的作品，给新加坡的人民带来了真实和生动的艺术。因此市民们对这次画展反响十分激烈，展览期间前去看展人数络绎不绝，到展览结束时，六十多万人口的新加坡就有三万多人参观过徐悲鸿画展。

徐悲鸿的新加坡筹赈画展，是他在东南亚地区进行艺术交流传播的起点。在画展开幕前，便有好友为他写文章宣传画展，《星洲日报》的《晨星》副刊出专栏评论，向大家介绍徐悲鸿，刊有黄曼士的《徐悲鸿先生略历》，郁达夫的《与悲鸿的再遇》，史记的《田横五百士故事》，银芬的《谈悲鸿先生的写实主义》，中间还穿插了徐悲鸿的画《北平记游》《怅望》《此去》《李宗仁将军》。

第二次画展是在印度的筹赈展览，此次是徐悲鸿旅印的第一场展览，由于展览开幕当日正是国际大学第三十九周年纪念，新旧学生及来宾近千人参观了画展，十分隆重，这次展览让沉寂已久的印度画坛掀起热潮。1940年2月，徐悲鸿在加尔各答的印度东方学社举行第三次个人画展，展品有206幅。印度东方美术学社和中印文化学会联合出版了画展目录，此次画展的举办尤为成功，徐悲鸿在印度美术界与文化界得到一致好评，促进两国民族的友谊。

徐悲鸿最后几次画展是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筹赈画展。这是他在东南亚之行的最后一站，分别由马来西亚各市当地的筹赈会主办。1941年2月8日至15日，徐悲鸿先生画展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开幕，并展出作品300余幅。通过在吉隆坡雪华筹赈会主办方的大力宣传与支援，当地各界人士均对徐悲鸿作品喜爱至极，成群结队前去参观，并争相请求徐悲鸿为其签名留念，表达对徐教授作品的极大兴趣。在后面几个月，徐悲鸿分别前往怡保和檳城举办筹赈画展，主要展出西洋画油画和国画两部分，杰作数百幅，除去原有的作品，又增设了在新加坡与印度创作的新作品《愚公移山》《放下你的鞭子》《泰戈尔像》《群牛》等。

二、展览缘起

徐悲鸿曾在新加坡华人美术会上谈话上提到，此次前往南洋地区举办筹赈画展，动机并不复杂。因德国领事对他的作品感兴趣，购去数幅，价值数百元。谭云山鼓励他赴印开画展，以售画所得作旅费。因办理护照及亲友挽留，故延迟至今才至星洲。由此看出徐悲鸿在1938年6月亦有赴谭云山之约前往印度办画展。同时在徐悲鸿《西江漂流日记》谈到，谭云山从印度归来，带来泰戈尔的邀请，希望他赴印度展览。可见此次南洋之行的原因亦为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徐悲鸿前往印度举办展览一事，以及为救国之际而前往新加坡的计划。

此外，徐悲鸿因感情纷纭而南行筹赈也是其赴南洋之行的原因之一。1939年10月20日徐悲鸿致信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时感叹他的情感问题，“既感麻烦则以流亡自解”。“以流亡自解”，这需要联系徐悲鸿的感情问题。1938年7月开始，徐悲鸿登报与蒋碧薇结束婚姻关系，而另一方面，由于孙多慈父亲的阻拦，徐孙结婚一事付诸东流，感情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徐悲鸿在1939年前往南洋也带有对感情处置的无奈，便有“以流亡自解”之情。

1939年徐悲鸿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时，《南洋商报》晚刊刊出的总督夫妇、林文庆参观画展的新闻图片，并赞颂徐悲鸿的素描为“东方第

一”，推崇其人其画。徐悲鸿即时将该报纸寄赠于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科的吴作人、艾中信等人，分享他此时举办画展能筹得款的喜悦，并告知他们此时卖画已筹得一万一千。可见徐悲鸿对拯救国家的重视，肩负起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他在1939年8月于《星洲日报》发表《半年来之工作感想》一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前方将士的崇敬和爱国精神，这份感情基于徐悲鸿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和对民族精神的捍卫，通过传播个人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宣传抗日民族精神，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使国家度过这个难关。

综观上述内容，徐悲鸿并非单一原因而赴南洋之行。首先是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民族深陷生死存亡之际，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通过自己的个人艺术作品“参与”抗战，他忧国忧家，以笔为矛，绘制作品，不辞劳苦远行，计划到国外举行筹赈画展，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另外，受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前往印度举办展览，宣传中国文化艺术等内容。再加上徐悲鸿的感情纷纭，共同促使徐悲鸿远行前往南洋办展的决心。

三、多方参与

前文所谈，徐悲鸿1939年至1942年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出发到南洋举办筹赈画展，筹款捐助无家可归的难民和前线战士。徐悲鸿在新加坡筹赈画展所展出的作品中，人物、鸟兽、花卉、山水无不涉猎，运用托物言志、借古喻今的表现方式来反映当下，如《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等作品，也有《巴人汲水》《荷簪巴妇》《南京一多》等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一批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民族精神，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巴人汲水》是徐悲鸿于1937年创作的中国画作品。抗战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看到山城百姓从江中汲取生活用水的艰辛劳动场景，整幅作品高300厘米，宽62厘米，画面人物刻画生动传神，细腻地描绘了重庆人民传统取水的场景。画面真实记录民众阶层生存景象，包含了他对重庆百姓苦苦生活的深切同情和怜悯之情。其作品所表达的“巴人汲水”精神，彰显了山城百姓抗战时期坚不可摧的力量。

正是这些作品宣扬中华民族不畏艰险的抗战民族精神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给新加坡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司经理陈延谦十分支持徐悲鸿展览，他购买展出的作品，并介绍自己的好友前去捧场购画。星洲名媛珍妮小姐为大力支持徐悲鸿的南洋筹赈画展，请徐悲鸿为她绘制自画像，并支付十万多新币。由此看出，广大华侨虽然身在海外，但心系国内，对中国抗战事业筹赈捐款，积极出力。除了给华侨绘制画像外，徐悲鸿还受邀为新加坡汤姆斯总督画像，总督亲自多次到江夏堂当模特儿。此幅名作珍藏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为汤姆斯总督画像，再赠送给新加坡市政府，这是新加坡艺术史上两全其美的艺术，这让徐悲鸿不仅在广大华人心中取得较高的艺术地位，也成功地将自己的艺术吸引到了英国殖民政府放入最高层次和英籍侨生华人支持抗日战争，在那个时代，是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能与他匹敌。

在新加坡期间，徐悲鸿还创作了反映中国抗战事业题材的一批作品，如1939年10月创作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此幅作品的创作缘由是徐悲鸿在街头看见了由中国演员演出的抗战短剧并深受感触，便邀请王莹前去江夏堂为其画像，将当日所见场景绘制出来。整幅画作高144厘米，宽90厘米，以接近真人的比例创作出这幅抗战题材画作。画中女子身着戏服、手执红绸，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二，背景则是以几组人物和建筑组成。人物刻画细腻，主人公“香姐”形象与神韵十分生动，以相对静止的画面，凸显丰富的内心活动，与背景相对直立的人群形成强烈的反差，将身着不同衣着、不同神态的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达到戏剧的力量。

1939年11月15日第10期《星洲晚报》“繁星”版发表黄孟圭《题王莹女士画像·二首》诗后有其一段序文：余友徐悲鸿教授，近为中国救亡剧团王女士写演剧画像，女士扮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中之香姐，在村庄中歌舞……固慕女士之热心救亡，亦爱余友绘事之工，异日斯画流传，其有俾于抗战建国益可知矣。黄孟圭所言徐悲鸿创作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彰显了王莹作为“中华女杰”的爱国精神，她为宣传抗日救国，四处奔波义演募捐筹款。通过这幅爱国油画杰作在新加坡的宣传，不仅传达了画家的爱国思想，同时激发华侨爱国和民众抗战的决心，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抗战民族精神。

1939年11月徐悲鸿携带600幅画从新加坡前往印度。12月14日徐悲鸿由印度国际大学教授谭云山陪同参观印度美术学院，受到热烈欢迎。《大众（上海1939）》1939年发表《宝贵的同情：印度伟人同情中国抗战，泰戈尔谓中国绝不屈服》，12月间大陆记者也曾访问泰戈尔，泰戈尔对于中日战时之态度，该函称：“中国为不可征服之国家，人民精诚团结，正为其国家创造一个新时代。中国继续抗战，一时之失败绝不能摧毁其抗战精神。”徐悲鸿在印度期间多次拜访泰戈尔，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由上述材料可得知，作为印度诗人、社会活动家与民族主义者的泰戈尔，对于此次徐悲鸿在印度的筹展展览表示热烈欢迎，称他为中国伟大文化的使者；并建议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为徐悲鸿举办后续画展，以敦睦中印两国友谊。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深感同情并大力支持，认为中国是不会被征服的。

在南洋行旅期间，无论是徐悲鸿举办的多次筹展画展，还是私人之间的交谈或是公开场合的交流以及在各个高校开展的艺术演讲，都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争取到了各地领导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与援助。徐悲鸿用自己的画笔，创作的一批反映中国抗战题材的作品来向世界传达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四、历史回响

徐悲鸿的这批精品首次在海外展出，作品蕴含的时代精神与多样化的艺术形式让东南亚地区的人民耳目一新。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是当地人民对徐悲鸿画展及其作品的直观反映，民众观看画家独特的现实题材作品，了解到中国美术，这些也是南洋画坛上从未展过如此精彩的巨幅作品。

在新加坡的筹展画展中，总督夫妇莅临会场开幕式时，都对徐悲鸿的《奔马》作品赞不绝口。在画展期间，新加坡的报章称赞徐悲鸿：“尤其是画人像为一时无两。画像最难传神，所谓传神阿堵，难之又难的事，可是徐教授对于这一点最有把握。”由此看出这次助展展览在新加坡社会反响很大。作为一位驰名中外的中国艺术家，徐悲鸿的艺术作品亮相于此为新加坡画坛增添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并且在新加坡时，他还对友人提供建议关于新加坡画坛的发展，需设立美术馆并搜集历来的美术作品，以便大家皆有欣赏研究的机会，无论是私人交流还是公共场合的谈话都对新加坡美术爱好者带来影响，推动了中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

在1940年印度加尔各答东方学社举办的徐悲鸿个人画展中，泰戈尔诗翁和印度艺术家南达拉尔为画展亲笔写序。泰戈尔与南达拉尔都认为徐悲鸿的访问活动和艺术实践为印度的美术带来了不同的艺术气息，他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不仅给印度收藏家、美术爱好者和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印度艺术家和美术专业学生对中国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给印度艺术爱好者们带来了灵感与创作激情。对于宣传中华文化艺术，连结中印两国友好感情起到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徐悲鸿在印度不仅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并且受邀成为国际大学美

术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客座教授。徐悲鸿的访问和艺术实践使中国学院成为文化交流的焦点，吸引当地艺术家前来交流。他的作品受到热烈欢迎，同时他与艺术家们深入交流心得。此外，他传授中国水墨画和书法技艺给学院的学生们，使他们领悟中国艺术之精髓。

在槟城期间，徐悲鸿除了忙于办画展和创作绘画，还与当地文艺界，美术界人士广泛交流，并向青年画家传授经验，凡有向他讨画者，他都慷慨赠送。同时徐悲鸿为槟城的艺术提供了建议，槟城艺术协会便是在他倡议下成立的。

综上所述，这一次的南洋之旅是徐悲鸿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使者，让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发展起来，其中有两个意义：其一是徐悲鸿通过积极举行筹展画展，在当地宣传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作品，广泛传播中国文化艺术，推动中外文化艺术的合作与交流；其二是徐悲鸿经常参加艺术活动，通过出席华人举办的茶话会和在当地学校进行演讲等来宣传自己的艺术思想，为南洋画坛融入新的血液，激发爱好美术青年的斗志，对于南洋艺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五、结语

总体而言，徐悲鸿作为20世纪杰出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在民族危难之际，远赴南洋，真诚地担任起一个“沟通文化的使者”，他以艺术的方式参与中国抗战事业，引起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关注、同情与支援。徐悲鸿在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地举办的一系列筹展画展，进行社会活动，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宣传中国美术，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向世界宣扬中华民族对和平与自由的向往。

在南洋期间，除了从国内携带而去的作品《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九方皋》《巴人汲水》《荷簪巴妇》《南京一多》等，同时徐悲鸿也在当地创作了一批反映中国抗战精神的作品，如《放下你的鞭子》《愚公移山》《奔马》等，这些作品的创作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他认为艺术作品应以真善美为准则，努力更真实更形象表现社会现实。在民族危难时刻，作者用自己的画笔，通过绘画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作品本身不仅是代表艺术家艺术生涯巅峰的杰作，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画作背后皆以民族自信自强为指归。徐悲鸿以他独特的创新绘画风格，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的魅力。在东南亚地区，他的作品启发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引领他们重新审视中国美术的价值。同时，徐悲鸿的作品也激发了南洋美术家和美术专业学生的热情，使他们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美术，为南洋画坛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项目基金：

本文系国家社科艺术学青年项目“台湾地区藏中国抗战时期美术史料档案整理研究”（项目号：19CF1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欧阳兴义《四十六年前的艺坛盛事》[N].《联合晚报》，1985.
- [2] 王震《徐悲鸿文集》[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9)-202.
- [3] 黄丽丽《活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上的中国画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 [4] 张眠溪《流亡与赈济——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信所见其南洋、印度之行》[J].《中国书法》.2016.
- [5] 邵晓峰《徐悲鸿图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1(12)-162.
- [6] 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12)-212.
- [7] 衣若芬《南洋风华》[M].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1)-184.
- [8] 上海《大众（上海1939）》[N].1939(2)-22.